

CANADIAN NURSE IN CHINA



在中国 当护士的年月

1933—1939



〔加拿大〕琼·尤恩著

时事出版社

在中国当护士的年月

(1933—1939)

〔加拿大〕 琼·尤恩著

黄 诚 何 兰译

时 事 出 版 社

1984年

Canadian Nurse in China

Jean Ewen

McClelland & Stewart, Ltd.

1981

在中国当护士的年月

(1933—1939)

〔加拿大〕琼·尤恩

黄诚 何兰译

*

时事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万寿寺甲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时事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75 字数: 124,000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8,000

统一书号: 11225·005

社科新书目: 102—64

定价: 0.57元

99561

译者的话

琼·尤恩女士出身于加拿大的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曾是加共的领导人之一。一九三三年，她在护士学校毕业后，曾来我国山东省，在加拿大天主教会开办的诊所里工作，学会了中国语言。一九三七年底，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组织了“援华委员会”，派白求恩大夫为首的医疗队来华；当时，尤恩已经离开教会的诊所回到加拿大工作了，但为了援华，她欣然作为医疗队的成员和翻译，与白求恩同行。在延安，受到了毛主席亲切的接见；在武汉、长沙、桂林，得到周恩来同志的关怀。白求恩大夫去五台山工作后，尤恩留在陕北和晋绥边区的军医部门工作，同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九三九年一月，她又接受史沫特莱的托付，不畏艰险，从上海把国际友人捐赠的一批医疗物资运给皖南的新四军，并帮助培训战地医务工作人员，直到同年六月才离华返回加拿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恩满腔热情，一再给敬爱的周总理来信祝贺和问候。根据周总理指示，中华医学会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她来华访问，尤恩本人也一再表示愿来看看新中国。可惜由于年迈体弱，至今未能成行。一九七九年九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同志和副会长陆瑾同志访问加拿大时，专程到尤恩家中拜访，感谢她在我国人民困难的时期所给予的援助，并祝愿她早日恢复健康。

令人高兴的是，尤恩虽然疾病缠身，但对于近半个世纪

前的往事，记忆犹新；而且写成了一本回忆录，一九八一年出版，一九八三年再版。

在回忆录中，作者记下了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九年在中国的非凡的亲身经历。阅读全书，有如展开一幅三十年代中国的素描长卷，既可看到旧中国的贫穷落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也可看到中国人民在觉醒、在奋斗，特别是我党、我军与全国人民一道英勇地进行抗日战争。尤恩同我国老一辈革命家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贺龙、叶挺等同志都有过接触，她以友好的笔触来描画他们给她留下的印象。书中还有不少饶有趣味的革命历史资料，值得一读。

我们把这本回忆录比作素描，因为它正象素描画一样：简明、生动、形象突出。但素描的笔触毕竟是粗线条的，写人状物不可能很细致、甚至难免有不够准确之处。为此，译者作了一些考证和校正，或加注释，或删除个别字句，以免传讹。

尤恩女士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其回忆录的中文版。她这番心愿当然是可以理解的。译者不揣文笔粗拙，将书译出，希望以此致慰于本书作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并希望此译本问世，能对中加两国人民日益增进的友谊有所贡献。

一九八四年四月

前 言

本书谈到的事情，已老早过去了。我无意置评其是非，也不作任何暗讽影射。我深知骂我的大有人在，骂我撒谎、诋过、托派分子或诸如此类。对我所讲的事，谁想核实，欢迎光临敝舍。凡是勤于探索的有识之士，定会发现它们全是真实的。三十年代业已一逝不复返了，在此之前及其当中我所经历的生活，有时如狂风骤雨，有时则令人丧气灰心，但从单调乏味。

目 录

前 言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20)
第 三 章	(29)
第 四 章	(38)
第 五 章	(50)
第 六 章	(64)
第 七 章	(74)
第 八 章	(94)
第 九 章	(104)
第 十 章	(118)
第十一章	(137)
第十二章	(160)
附 录一：万里探故友	陆 瑾 (164)
附 录二：回忆白求恩和尤恩	许飞青 (169)

第一章

1933年3月，“白色皇后号”邮船徐徐离开温哥华的格朗维尔街码头。我记不清当时我在想些什么。但我却回想起码头上的乐队奏着“你还会再回来”的曲子；巨大的寂寞感一时把我压倒了，我看着身边的两位朋友，罗斯·马丁和艾格尼丝·谢弗，她俩都热泪盈眶。

“别哭鼻子了，”我说。我提醒她们，我们已如愿以偿。现在我们已走上去中国的航程，要改变主意已经晚了。

留在我们身后的加拿大当时陷于经济萧条的困境中。我们是刚毕业的护士，能找到一份工作就是够幸运的，更何况又是一份很不寻常的工作哩。当初艾格尼丝提议我们去申请工作，罗斯和我以为是说着玩的，也跟着她去了。当时护士有的是，我们根本没想到会被选上。但很快我们就被圣心省天主教方济各会的神父们接见，并且填写了我们的申请书。随后，又获悉我们很快就要以教士的名义出国工作，而且去的地方想不到竟是中国。

东渡之前，我要去多伦多探望我的家人。这次探亲并不愉快。我父亲是因“煽动罪”而被捕的八个共产党员之一。我到家时恰好遇上他不服上诉的审讯时期。

父亲同我从来不亲密。1919年我母亲患流行性感冒去世后，父亲就带着我和弟弟妹妹到萨斯喀彻温省的一个牧场居

住，当时他在那里当铁匠。牧场主之妻给我父亲介绍社会主义，那是她在纽约兰德社会主义学校学来的。不久，父亲就开始读《资本论》，到1924年离开牧场时，他已经准备为社会主义革命效力了。他当一个革命者的角色比起当自己四个孩子的父亲来，可是更有兴趣得多。

在随后的几年中，他的全部时间和金钱都给了党。我们兄弟姊妹四人，都是他所从事的历史大业之外的闲人。势所必然，我们成了无所依靠、自食其力的小家伙。1927年，我父亲成了党的专职工作人员，不久我们就搬到温尼伯。那时候我已离开了学校，好不容易先在一间洗衣店工作，后来在北温尼伯的圣约瑟夫医院学护理。

时光飞逝。护理生在医院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每周工作六天半，晚上才上课。而换来的只是餐餐土豆、豆子，以及一年的津贴：十二块美元。整天没有点儿空闲，工作劳累不堪，很少听得到外界的新闻。连1929年股票市场砰然崩溃，我们也一无所知。

当我的第二年实习快结束时，我家迁去多伦多，我也就同他们断了音讯。到1931年12月报刊上开始大登特登关于八个共产党员因“煽动罪”而被捕的消息。我对“煽动罪”是怎么回事也弄不清楚，但人人都知道我父亲是被捕者之一。每天一早，《温尼伯自由报》的头条新闻全是披露汤姆·尤恩及其同伙的罪状。

审讯似乎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报纸对此报道得详尽无遗。后来有一天，报纸登出：“劣迹昭彰的赤色分子被判入狱五年”。对很多人说来，也许这消息可以使他们睡几晚好觉了，至少，在他们还未知道赤色分子决定不服上诉之前，是

可以高枕无忧的。

正是在进行上诉的时候，我回到多伦多家里向亲人道别。我的弟弟妹妹都到奥斯古德厅法庭去听审，但我没有去，拿鞭子赶我也不去。上诉的结果没有改变下级法庭所做的判决。入金斯顿监狱坐五年牢对汤姆·尤恩来说是无可更改的了。我最关心的是我的妹妹伊索贝尔和弟弟布鲁斯如何过活。倒是他们高高兴兴地宣布能照料自己。伊索贝尔说一位朋友在一间咖啡店里给了她一份差事，从早上七点干到晚上六点半。小布鲁斯则在放学后到另一位朋友的印刷厂去工作，从下午四点一直到半夜。他们能赚得一大笔钱啊！每周五块美元！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使我不禁发问：开饭馆和印厂的好同志怎么能“慷慨”到如此地步啊！

弟弟和妹妹得知我要去中国都大吃一惊。但末了，他们都为我的前程高兴，而且也深感兴奋。他们热烈地要求我每天给他们写信，把所看到的和学到的一切有意思的事情告诉他们。

就这样，我父亲应加拿大政府“邀请”到那金斯顿“作客”之日，正是我同我的朋友奔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之时。在温哥华，我们登上开往东方的“白色皇后号”。

离开温哥华两天后，冬天的凛冽寒意消失了。我们很快脱下黄褐色的冬衣，换上白的或花色的夏装。大海看来变得更加深蓝；一层层卷起的浪花白得闪闪发亮，令人眼花缭乱。成群结队的海豚在船边嬉戏。这种情景，确是令那些只见过小湖而从未见过大海的旱地生活的人心旷神怡。

经过五天的航程，我们到达檀香山及其附近诸岛。陪同我们去中国的是文森特·施雷姆普神父，他的朋友们上船来

把我们带上岸去。坐着他们的罗尔斯·罗伊斯牌轿车，我们游览了市容和郊区，然后驱车到他们那宫殿般的邸宅去吃晚饭。这一顿夏威夷饭大大超过了我们的预料，是一次地地道的宴会，甚至有用芋头做成的风味食品哩。菜肴之丰盛，使我们叹为观止！

饭后，文森特神父跟主人聊天，我们就跟别的陪客出去跳舞。他们都彬彬有礼，一本正经。我相信他们是一秒钟也没忘记我们是准备去当教士的。快到午夜，我们对他们的盛情款待表示感谢并告辞回船。

我们沿着码头走着，遇上了好几位在船上管事的高级船员，他们一口咬定：不到美丽的怀基基海滩逛过的人是不能离开檀香山的。临近海滩的地方，当时有两座旅馆：莫阿纳旅馆和夏威夷皇家旅馆。那几位船员把我们带到莫阿纳旅馆去跳舞，在那个年代这家旅馆算是相当豪华的了。当晚，我们一唱再唱“不到天亮不回家”这支歌子，因为船员们说：不看看日出就不能离开这个可爱的地方！我们果然看了日出，是站在一块有着棕榈树荫的大石头上看的。瞧，多欢乐啊，这些传教士们！我暗暗自言自语。

我们回到“白色皇后号”吃早餐。上午十一点，在夏威夷语惜别歌“阿洛哈·奥埃”的曲调声中，我们的船慢慢地滑向大海。罗曼蒂克的船客纷纷把自己的花环扔进海水里。当地有这样一个传说：倘若花环漂回岸边，戴过那花环的人便会有朝一日回到这个群岛来。我没有拿定主意要不要再回这里来，就把花环留在身边。过了几天花儿凋谢了，我还舍不得扔掉。

我们的船驶近横滨，烂鱼的臭味越来越刺鼻，令人作呕。

日本海关人员上船来很快地检查了护照。他们似乎对我们为什么要去中国并不特别感兴趣。

下一个港口是神户。我们对当地人穿的服装印象最深。各式各样的装束，有西方的，有东方的，还有东西合璧的——西服上衣罩着和服，脚下则是木屐。我们在神户停留的时间很短；它是一个军港，有很多大炼焦炉和船坞。神户的气味跟横滨一样难闻，而且惊人的脏和乱。然而我们还是上了一趟“茶馆”，席地而坐，使用筷子，把热气腾腾的食品蘸着小杯里打匀了的生鸡蛋来吃。这顿饭吃得很热闹。艺伎要坐到文森特神父的大腿上，神父死劲拒绝；艺伎又为他跳了樱花舞。他满脸通红，假装不懂得舞蹈的含意。

时光过得真快，远处的灯光忽隐忽现。我们离中国的海岸越来越近，再过两天旅程就将结束，但或许，旅程才刚刚开始哩。

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在1933年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它是外国帝国主义的纪念碑，但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说则是堕落和耻辱的渊薮。上海的摩天大楼和漂亮的大厦是用奴隶劳动为石油公司、银行和造船公司建造的。沿着从码头出来的大道有一座漂亮的“外滩公园”，铁门上挂着两种文字的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横过马路是英国领事馆，门口有英国卫兵站岗，背着上刺刀的枪。

一个在山东传教的教士来迎接文森特神父。他把我们安顿在贝达德夫人的家里，她在法租界开办一所膳宿学校。我们发现，法租界除了公共建筑物上挂三色旗和街头拐角处的巡捕说法语以外，同公共租界没多大区别。我们除了跟街上的人力车夫和乞丐有接触以外，没有接触别的中国人。在上

海呆的时间很短，但我们还是尽量各处多跑跑看看。

五天以后，文森特神父来看我们，说他已经给我们定了一艘开往山东青岛的日本近海轮船——“大连丸”的船票。我们原先希望能乘火车——“蓝色特快”，借以观赏乡村景色。现在，只好无可奈何地上了船。“大连丸”象别的日本船一样，极其干净，但仍然有着一股烂鱼和洗衣房的气味。就这个季节来说，黄海算是比较风平浪静的，行船十分平稳。

第二天大清早，我们就到达青岛。这是一座布满红瓦白墙房子的城市。起起伏伏的山坡上长满了短叶松。两名教士赶着一辆讲究的马车来接我们，可惜那拉车的马和骡子却很不讲究。车子是敞蓬的，设有两排相对的座位，两边都有门和登车的铁踏板。显然，这车子曾经显赫过一时，但现在地毯的绒毛和座位的天鹅绒面都已磨损不堪了。

我们乘着车子从码头到火车站，一路上也许很气派。许多孩子跟在后面跑，伸着手喊着，“我饿了，给一点吧！给一点吧！保佑你发财。”据说，讨饭也是一种体面的职业哩。大多数乞丐归属一个帮会，每天把讨得的上交，然后从帮会得到吃的、穿的和睡的地方，还得到庇护以逃避警察的逮捕。大约九点钟，我们坐上从青岛开往济南的列车。火车通常不准时开行，可是那天却很准时。因此，当晚我们就到达了张店的教会大院，这将是我们的短期内的家。张店是一个能想象有多脏就多脏的市镇。我相信，我们吸进的各种气味是任何西方人从来也没领略过的。

张店是张氏宗族的老家。大多数家庭彼此都有点儿沾亲带故。老一辈姓张的在本地开设并经营制革作坊，一天三班，一周干七天活。烂皮的臭味和用来鞣革的化学药剂的气味弥

漫着整个市镇。人们常开玩笑说，如果谁家的猫呀狗呀丢了，不出一个礼拜，准能看到它的皮挂在制革坊的墙上。

罗斯、艾格尼丝、文森特神父和我在大院门口受到一位美国护士伯莎·比勒和本堂神父菲利普的迎接。砖砌的院子围墙高达六英尺，墙头上还装上三股铁蒺藜。前门有一间号房供守门人使用；从那里他能监视每一个叫门或叫卖的人。

在院子里，小径两旁都栽着树，还有一丛丛的玫瑰花，给单调的屋子添上了悦目的外观。穿过号房就是一排排的房子，其中一间朝街的用作诊所，病人有来治眼的、换药的，也有受轻伤来请一位姓白的护士照料的。

当我们到达时，谢尔大夫和白小姐正忙着照顾病人。他俩热烈地欢迎我们，那股热情劲儿真叫我们感到有点儿不好意思。谢尔大夫不能说流利的英语，而我们又不会说德语或中国话，但通过白护士，我们好歹能表情达意了。谢尔大夫是在济南圣约瑟夫医院工作的，每周只能从济南来张店服务一次。

在教堂举办欢迎晚餐，这成了全镇的大事。由于当地极少有新来的外国人，所以对教士的领队文森特神父，甚至连当地乡绅和市政官员也前来表示欢迎。

我这个人老是冒冒失失的，而且越想弥补反而越糟。那天晚上，我一开始就打听谢尔大夫是否也是教士。

“你是什么意思呀？”伯莎反问。

“没什么，我只想知道他除了做教会的工作以外，是不是也布道？”我说。

“哦，不，”伯莎说，“那样干不合适。”原来教士同医生是有分工的：教士是不管治人的肉体病痛的，他只管治精神

病痛。她还告诉我，教士们要干的事情多着哩，他们管辖的教区范围很广。有时，他们还要办学校，给那些将来可能当教士的中国青年男女授课。

在最初的日子里，我们专心学习语言，这种学习本身就是长期的主要活动。因为没有办法绕过这个问题，不懂当地人民的语言，一个教士就象是聋子和哑巴。把自己孤立起来可能是致命的。除了学习通常用的方块字以外，我们还要懂拉丁文，以便学习一位意大利主教创造的中文拼音文字。为了解决一些笨学生和外国人对付不了中国方块字的困难，这位主教采用拉丁字母以及某些俄文和希腊文的字母制成新的拼音字母，用他这种拼音字母来写中文就不那么艰难了。

我们的老师是一位学术根底不浅的有身份的人。他彬彬有礼，但是却没有能耐引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除了“请”和“谢谢你”以外，我只学了三、四个短语就开始自学起来。我碰上的每个人都是我的老师。我指着狗、马和身边任何东西用汉语问，“这是什么？”中国人是最有礼貌的民族。如果你说错了他们不会笑你（无论如何不会当着你的面笑），而会帮你纠正错误并教你怎样正确地发音。不过，我相信我初学时一定曾引起过他们私下发笑的。

两个月后，我的汉语口语算过得去了。这真有趣啊。我甚至到集市去，在交易最活跃的时刻，同商贩们讨价还价。

我们不久就被分配到诊所照料门诊病人，也到重病号的家里去，将就他们的环境条件给他们护理。中国房子大多是用土坯盖的，茅草屋顶有几英寸厚。门框和大门是用木头做的。窗框也是用木头做的，除非主人很有钱，一般都不安装玻璃而只糊上白色的绵纸。屋子都是一间挨一间地建在天井

的四周。厨房往往就是一个靠在墙上搭的披屋，炉灶挖在地下，安上一个大铁锅来煮大米和小米，旁边还有一个风箱用来鼓风助燃。

桌椅和饮食用具通常放在有炕的房间里。炕——这种中国床有两英尺高，炕下有两个到四个通风的口子，主妇们在寒冷的冬夜可以在开口处生火取暖。炕上铺着花哨的被褥，枕头都放在炕的一头。在一张又干净又暖和的炕上睡觉真是舒服极了。

鸡呀、狗呀、有时连猪呀都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老爱跟在孩子们的后面。孩子们七岁以前可以随意玩耍，但到七岁就被认为懂事了，就得去劳动了。女孩子年纪很小就学会做衣服、织布和做鞋子。妇女受奴役从小就开始了。尽管信基督教的父母已不再让女儿缠足，但非教徒妇女当中，缠足仍旧流行。缠足女人走不了路，只能用脚后跟摇摇晃晃地挪步，站着时也是前仆后仰地老站不稳。

我曾经以为教会学校是开明的机构，开通而且比较自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并非如此。所谓女童学校，其实是弃儿收容所的美名。女孩子成天在院子里扫呀、缝呀、洗呀。只有基督教教义问答课才有人教，那些老师自己也很少上过学。有许多女孩子经过自学，认得几个字，能读读报纸。但一般人都认为女孩子没有必要受教育。她们学了有什么用？生儿育女和种菜喂猪是不需要受教育的嘛。我问女孩子们：“为什么就不需要呢？”她们却都用惊讶的眼光回答我。

当这些女孩子要结婚时，男方不用给女方聘礼之类的东西，但未来的丈夫要给教堂赠一笔相当大的捐款。依我看，这两者其实是一样的。

在封建制度的中国，一个妇女只有她的孩子们长大了，她当上了婆婆以后才被承认是一个人。这时她就有权去欺侮、去打、去骂她的媳妇。当婆婆的总是尽量想方设法把年轻的媳妇折磨得够呛。最悲哀的是那些没有生儿子的年轻妻子，因为丈夫纳妾后很快就会把她遗弃。

我们的诊所对什么病都给治，从趾甲内长直到麻疯病。在张店周围有好些瞎眼的麻疯病人，拄着拐棍，敲着讨饭碗发出刺耳的声音。只要一个麻疯病人走进小巷，附近的人，甚至狗，都赶快跑开。

有一个老头儿经常走过我们的诊所，喊着，“可怜可怜我吧！”他脚上裹着几层破布，肮脏破烂的裤子遮不住骨瘦如柴的双腿。在暖和的大白天，他不穿上衣，可是老戴着一顶象头巾式样的白帽子。白色是丧服的颜色，只有死人才裹上白布。麻疯病人没有家室，没有钱财，实质上等于已经死去。

我问谢尔大夫我们是否可以给麻疯病人看病。

“可以，但我们必须戴上橡皮手套，只能在门外给他看病，”他解释说，“如果我们让他进入候诊室，别的病人就再也不会来了。他们非常害怕传染。”

那个老人的一只手的指头已经掉没了，他身上、特别是背上长的疮看了叫人恶心。谢尔大夫问了他很多问题，得出的结论是：他的疮可能不是由于麻疯病而是由于营养不良引起的。

夏季，天气越来越热，制革作坊的臭味越发令人难忍。我们的教会所在的山东，当时被认为是中国最繁荣最富裕的省份。很多人家在他们的地里种果树。杏子、樱桃很容易买